



论语

大雨指向的城市

■ 王 芳

两年前我到北京办事,想着有时间可以去拜谒袁崇焕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袁督师,督辽战绩与凌迟处死的结局形成一种相反的张力,映照出明朝必然的结局。那时,我刚读完东莞作家詹谷丰的《半元社稷半明臣》。袁崇焕是詹谷丰的乡贤,詹谷丰不惜笔墨,为其作注。读完后,悲怆之情难抑,于是我寻访袁崇焕墓的念头便愈发强烈。

在袁崇焕纪念馆,两元钱门票加两百米步行就可以抵达袁崇焕墓。没想到的是,墓园前忽至大雨。罢了,既已湿透,我也不必返回,还是在墓园毕恭毕敬叩拜。小小的墓穴藏身在北京闹市之中,旁边是把袁崇焕尸骨抢出的余姓义士之墓,墓更小,心底有繁华映衬出来的苍凉。

同样的情形,我还遇到过一次。四年前,我为写作《戏中山河》,到山西宁武华盖山上寻找周遇吉墓。周遇吉是明朝最后一任山西总兵官,在宁武关之战中,被李自成大军乱箭射死,死后全家被焚,史称一门忠烈。那天我去的时候,也是晴天,到墓园后,大雨倾盆而至,我只来得及三叩首,便已被阻隔在山上,大风大雨差点要了命。

周遇吉比袁崇焕晚死了14年。袁崇焕死后,山海关防线崩溃,周遇吉之死是明朝与李自成最后一场大战,李自成再没遇到抵抗,长驱直入紫禁城。都是改变历史的细节,同样的悲壮,同样的惨烈,他们也给了我同样的“待遇”。

而我始料不及的是,两种场景,对两个人的不同怀念,最后会纠缠于同一本书中,还是东莞作家詹谷丰,书是《一座城池的一百张面孔》。城是东莞。纠缠之处在于

史上最难的一次外卖

■ 吴 婷

电影《长安的荔枝》落幕,银幕渐暗,主人公一家三口坐在荔枝树下被镜头拉出远景,画面平静悠然。我坐在原地久久不能动弹。想起几天前还在西安,在西安街头游走的记忆与银幕上的荔枝影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时空错位。这个因“一骑红尘妃子笑”而闻名千年的水果,如今已成为这座古城的一种文化符号。

在西安的六天里,我没有吃一粒米,也没有想到吃一枚荔枝,每天全被面食填满——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裤带面——却未曾想过寻找那颗曾让杨贵妃一展笑颜的南方珍果。

这是史上最难的一次外卖。岭南到长安,中间相隔数千里。在那个年代,这件事不啻于天方夜谭。为了运荔枝,上林署的李善德由一脸朝气的青年,变得满头白发、满眼血红,期间,仅仅才过百天。主角李善德运送荔枝的疯狂执念,在当代观众眼中显得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这个老实本分的小官吏,明知自己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 一枚弃子,却依然耗尽心力研究荔枝保鲜之法,测试各种运输路线,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他的行为逻辑让现代人困惑——为何要为一个注定将自己吞噬的官僚体系如此忠诚?为何要为一场注定是政治表演的“荔枝秀”付出全部?李善德若不是主角,怕是早死了八百遍。可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个替罪羊,明明知道朝廷和岭南的人都不希望这一趟运送成功,他却还是要费尽周折。最讽刺的是,在李善德舟车劳顿,好不容易把荔枝送到长安城门前时,却被人派刺客刺杀。若不是忠心耿耿的邑奴,他连性命都难保。最后,荔枝送到了,李善德依然被贬到岭南去种荔枝。虽然官帽子丢了,但我却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因为他们一家人可以坐在自己种的荔枝树下,吃着刚摘下来的新鲜荔枝了。



p 品读

夜读聂小倩

■ 杨松华

《聂小倩》是《聊斋志异》中最负盛名的经典篇章之一,讲述了一个人鬼相恋、邪不胜正、救赎与重生的动人故事。再次重读,我又为其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

浙江书生宁采臣为人慷慨正直,重信守诺,常对人言“生平无二色”——有妻子在世,终生不找第二个女人。他到金华办事,暂住在城北荒凉的兰若寺。与寺中先住下的陕西人燕赤霞(实为剑仙)结识。两人起初各住一房。

就在宁采臣住下的第一个深夜,一位绝色少女(聂小倩)主动进入他房间,企图以色相诱惑。宁采臣严词拒绝:“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小倩转而以黄金相诱,将一锭黄金置于褥上,宁采臣又断然拒绝:“非义之物,污吾囊橐。”

小倩被宁采臣的浩然正气所震慑,感叹道:“此汉当是铁石人!”她心生敬佩,转而友好地警告宁采臣,寺中有妖物害人,自己实为被胁迫。她告知躲避妖物的方法是与燕赤霞同住,并恳求宁采臣将自己的骸骨迁葬回乡以获解脱。

原来聂小倩本是十八岁亡的少女,葬于寺旁。她被盘踞此地的两个千年妖物姥姥和夜叉所控制,被迫先

三个字“佛郎机”。

詹谷丰写道,袁崇焕曾用佛郎机巨炮,把一代雄主努尔哈赤击伤于马下,不久后身亡。继而,詹谷丰提到了佛郎机本身,明朝所用这种火炮出自东莞。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明军与葡萄牙人在东莞屯门交战,缴获了佛郎机炮,时任东莞白沙巡检何儒,拆卸了佛郎机进行研究,竟然仿制成功,何儒还借此升迁。中国式佛郎机仿制成功后,便投入明朝的对敌战争,屡有斩获。

到周遇吉对敌时,佛郎机已经仿制成功一百多年了。宁武关当时配备佛郎机,只是周遇吉一个战将已经拉不住一个垮掉的王朝。佛郎机哑火后,只能巷战,终至以身殉国。周遇吉是袁崇焕之后,明朝朝廷拆掉的最后一道防线,孤立 in 关城,无人援救。不过,袁崇焕比周遇吉更悲壮,因为他是被崇祯下令杀掉的,一刀一刀血肉横飞,自己效忠的皇帝举起的屠刀,更锋利血腥。

一个佛郎机,轰开了东莞这座城市,一百张面孔须眉张扬,怒目报唇,似有许多言语要诉说。

一介书生李用,“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劝女婿熊飞起兵抗元,自己却用气节叩响东渡日本的船板,幻想可以说服日本派兵勤王,他的书生意气,终究只能是意气书生。乱世枭雄何真起兵于元末,原本只是想保境安民的书生,纵马驰骋在岭南的土地上,归顺了明朝,却挡不住死后的血肉腥风。清末书生伦明,誓要续修《四库全书》,为书奔走,穷困一生,宏愿却因日军的炮火彻底搁置。唐琴绿绮在岭南辗转,一代代琴人用琴音接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声。陈益把番薯藏于铜鼓中逃离安南,番薯苗

蓬勃时,带出他颠簸的命运。虽然陈益逝去了,但他带回来的番薯却养活了一朝朝蓬勃的人口。忠于国家的、廉洁为官的、续写文脉的,排列在东莞,那是不熟悉的城市,那是一个文明并不会比山西更久远的城市,却因有这样的人,同样奏出黄钟大吕之声,让我肃然起敬。

詹谷丰用这样的满纸锦言金句,向乡贤们致敬。他撕开天穹下的布帛,探知历史真相,一声声血泪吟唱,吟出的是民族的根骨,中国的筋骨。

我更欣喜的是,詹谷丰在史书之外的延伸,伸向历史缺失的触角,为我们固有的认知,多画了几条辅助线。我们知道陆秀夫背负赵昀崖门跳海,宋朝终结,但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结局里,李用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东行日本求助未果,只能在日本传道。等侵华战争爆发时,因日军认出李用画像,一个村子这才幸免于难。我们知道明初胡惟庸案、蓝玉案,极少人知道,受蓝玉案株连,对岭南稳定厥功至伟的何真,惨遭灭族。我们哪能知道一个书生,竟然能忍饥缩食,发愿续修国家工程《四库全书》? 我们 know 白鹿书院的存在,又哪知道,是东莞人翟福福于明初重修。我们以番薯延续的各种薯类果腹,又有多少人探究过当初它是如何从外城进入中国的?

这样延伸的辅助线,震撼亦动人,如同天地琴音,与伏羲唱和,“弹古琴就会通神明的大德,与合天地的至和”。

不仅袁崇焕与周遇吉需要大雨的祭奠,每一个深隐历史深处的为中华文明滴尽心血的人,都需要一场大雨,但大雨不会惠赐每一个人。

我很幸运。

赢。但李善德作为底层官员无法对抗权力体系,最终未能在右相面前为苏谅争取权益,导致合作关系彻底破裂。于是,他血本无归。

即使如此,苏谅却在李善德运送荔枝途中最严峻的一刻出现了。在所有角色中,商人苏谅的出现如一束温暖的光。这个精明的胡商,本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可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依然选择伸出援手。真正的朋友不在于合作的结局,而在于始终对你有一颗不肯放弃的心。这种超越利益计算的友谊,在权力与利益的绞杀中显得尤为珍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种情谊不需要完美结局来证明其价值,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残酷世界的一种温柔抵抗。

李善德被贬黜到岭南种荔枝,表面上是一种惩罚,实则是一种救赎。远离权力中心的喧嚣,他在荔枝树下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安宁。他被贬流放的次年,安禄山发动兵变,长安沦陷,他一家人却也正好躲过了一场战乱。世界全盘改变,他还有一隅安宁,这触发了现代人最深层的渴望。在一个变化快得令人眩晕的时代,能够“此心安处是故乡”已成为奢侈。李善德失去了官职、地位和曾经的理想,却获得了与家人相守的平凡生活。这种“失去中的获得”构成了一种深刻的人生反思——我们拼命追逐的,可能正是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东西。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生活的意义往往由失败者发现。李善德没能改变体制,却保住了自己的人性;没能飞黄腾达,却守住了家庭的完整。这种“失败者的胜利”对当代观众具有特殊的治愈力量——在成功学泛滥的今天,它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存在价值。它让我们思考:当青春不再,风华逝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遥不可及,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或许就像李善德那样,最后在一棵属于自己的荔枝树下,找到那份不被世界打扰的宁静。毕竟,在所有的长途跋涉之后,最珍贵的可能不是送达目的的荣耀,而是途中那些不肯放弃我们的人和最终能够安放此心的家园。所以这结果也未尝不是一种完美。京城的烽火和别人的争斗,影响不了荔枝树下的安宁。虽然青春没了,风华没了,仕途没了,但是那些东西也迟早会没的。相比一家人整整齐齐,和和美美地在一起,那些简直是九牛一毛。

若取其核心主题与寓意,当为“至诚至刚,邪不胜正”。

宁采臣的品格是故事基石。其“不贪女色、不慕钱财、不畏邪祟”的浩然正气,是抵御妖邪、感化小倩、最终获得善果的根本。这印证了人的正直品格具有强大力量。

反观当今落马官员,不仅抵不住财色诱惑,更无胆量抗击身边的“妖邪”,终让“邪祟”一点点侵蚀灵魂,彻底败坏。唯有自身强大,方能百毒不侵。

兰若寺之所以沦为荒寺,皆因过往僧侣与路人,无人能抵住以绝色少女模样现身的聂小倩投怀送抱,又难拒金钱诱惑。即使小倩刚开始只是被胁迫才会害人,可当她目睹一个个男人在其怀中丑态毕露,一个个女客被几锭黄金迷了心窍后,她身上的鬼邪之气自然见风而长,不想害人亦难。

而此番,她竟遇上了宁采臣这般坐怀不乱,且视黄金如污物、恐其“污吾囊橐”之人。正义战胜了邪恶,使恶鬼也束手无策。在宁采臣光明人格的感召下,小倩由害人转向自救与求救。宁采臣守信迁坟,给了她脱离苦海 的希望。最终,聂小倩在宁家的爱与阳气滋养下,完成了从鬼到人的彻底救赎与重生。这彰显了善念与信义足以改变命运的力量。

与《聂小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画皮》。《画皮》是《聊斋志异》中最惊悚诡异的人性寓言,讲述的是已有妻室的王生在晨间路遇一自称“逃妾”的妙龄美艳女郎后,心生贪恋,将其带回藏娇于书斋。最终因贪恋美色,遭女鬼(画皮伪装)剖心惨死。人若甘受欲望蒙蔽,将灵魂出卖给“美貌”魔鬼,终不免如王生般色丧命。

《聊斋志异》确宜夜读。那些鬼怪妖魔,仿佛能从一则则故事中跃然而出,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更容易让人窥见人形之下的本质。



讲述

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 聂世淦

每当想起所亲历的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我仍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1980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刚巧,这也是我的母校。从此,我躊躇满志地开始了教师生涯。第一年,我便担任了班主任。在我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带的班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文体活动均在同年级6个班中拔尖。不知何故,我们班在升初二时被拆散了,孩子们被零零散散地分到其他班上。年轻气盛的我找到校长,要求给一个说法。校长对我的过激语言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安慰我,并答应再交给我一个初一的班级,承诺跟班升到初三。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校长办公室。

因为知道这个新接手的班要带三年,所以我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发挥班干部管理班级事务的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学生交朋友,建立良师益友的师生关系。每个周末,我都要走村串户,上门家访,努力形成家校合力的教育环境。这三年,我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学生身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中考,我们班学生的成绩非常突出,不管是班总均分还是优秀率都在全区名列前茅。当年九月,我被评为庐山区(今濂溪区)优秀班主任,1985年1月份,我又被推荐为江西省优秀班主任。同年2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了1985年9月10日为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为庆祝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举国上下开展了隆重热烈的尊师活动。作为优秀教师代表,我被推荐参加江西省首届教师节表彰大会。参加大会的经历和待遇让我这个农村学校的青年教师永生难忘。

1985年9月9日,我参加了全市优秀教师表彰会,与来自各县区的10名优秀教师代表披红戴花站在主席台上。下午,市教育局派车将我们送到了火车站,把我们领进专用车厢。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昌方向飞奔。

16时许,我们到达南昌火车站。走出大厅,扎着大红花的大巴车早早便在站前广场等候着我们。大巴车在繁华的街道上行驶,窗外处处张灯结彩,气氛热烈。大巴车把我们送到了赣江宾馆,服务人员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客房,帮助安顿好我们住宿。晚餐十分丰盛,很多菜我闻所未闻。晚饭后,省领导们来到每间客房逐一看望和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当晚,我激动得彻夜未眠。

9月10日9时整,江西省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赣江宾馆大会堂隆重召开。会上,省领导为我与其他代表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我们还与省领导们合了影。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我和代表们纷纷表示,今后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把青春和才智献给教育事业。晚上,省教育厅为我们组织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从省城回来后,区教育局将我们几个受到省、市表彰的优秀教师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区属各乡镇作事迹报告。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我们的报告也在广大教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实,我明白自己取得的这点成绩还远远不够,与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也极不相称。但此时正值改革开放不久,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必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首届教师节到现在已整整过去40年,我也由激情飞扬的青年教师变成了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40年来,首届教师节的盛况我一直记忆犹新。当年的一幕幕也始终激励着我在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直至退休。

老基村的抗战往事

■ 刘秋香

天下故事纷繁,有幻想的奇谭,有生活的琐碎,有民间的传说。我自幼爱听故事,放牛时缠着村里的老人讲妖狐鬼怪,长大后守着电视听金飞讲《传奇故事》。但此生最难忘的,却是外婆村里那些真实的抗战往事。

老基村是外婆家村庄的名字。村庄坐落在江西安义的深山中,那里木竹葱茏,溪水绕舍,本是一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可日寇的铁路,连这样的弹丸之地也未放过。

母亲说,日军占领村庄期间,村民白日子里不敢露面,入夜后仍惶惶难安。但乡亲们骨子里的血性未泯,他们借“打野猪”的名义,夜夜点燃松明灯,在山间站岗,将敌情偷偷传给抗日的游击队。

深山里藏着许多逃难者。他们蜷居在山洞里,靠野果、山泉和村民偶尔冒险送来的红薯维生。这些逃难者若有孩子,一声啼哭便能招来杀身之祸。母亲曾跟我提到一个年轻的妇人。那时,她因貌美被日本兵的小头目强占。她常到村里借木盆洗澡,村民对她有看法,皆冷眼相拒。有眼疾的外婆见她尴尬,不忍心就悄悄地将她木盆送给她,并低声叮嘱:“你们这些难民也是受害者。但你要切记,守护好你的孩子,注意安全,要保守村民出行的秘密,规劝你那畜生少作恶。”

日军败退的那天,他们丧心病狂地纵火焚村。火舌吞没了村民和堂外公的屋舍,眼看要卷上外婆的老屋。那个年轻的妇人感激外婆曾经帮过她,竟奋不顾身地扑上,嘶喊着阻拦。最终,外婆家和邻户的房子侥幸留存下来。

今年7月,我想重返老基村看看那幢幸存的老屋,摸摸曾被烟火熏黑了的梁柱。可表弟说,因修建水利工程,老基村已沉入水底,所有的村民都搬迁到其他地方。

虽然,村里最后的见证也随波消逝,但当年的记忆还留在我们心里,如当时每夜点亮的松明灯,仍在大家的心底长明。